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國家」到「個人」：人類安全概念之分析

From "State" to "People": In Light of Human Security

doi:10.30390/ISC.200803_47(1).0006

問題與研究, 47(1), 2008

Issues & Studies, 47(1), 2008

作者/Author：蔡育岱(Yu-Tai Ts'ai);譚偉恩(Wei-En Tan)

頁數/Page：151-18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803_47\(1\).0006](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803_47(1).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國家」到「個人」： 人類安全概念之分析

蔡育岱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譚偉恩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人類安全概念提出以來至今已逾十年，始終沒有獲得安全研究領域的重視。冷戰結束後，雖有非傳統安全在研究上對傳統安全侷限於軍事問題的缺漏進行修補，但依舊忽略「個人」對於安全研究的價值。本文認為，目前既有的安全研究已不能迎合全球化時代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而把「個人」排除在安全研究的討論之外或是予以邊緣化，則為一種理解上的疏失。實際上，無論傳統安全所強調的軍事領域，或是非傳統安全所關注的貧窮、發展、疾病等問題，其核心與基礎的安全價值均構築在每一個「個人」身上，這歸因於安全概念就像一道不可分割的光譜，儘管歸結出許多不同面向，但當其中一個安全面向受到影響時，其他面向也會受到波及；互賴現象不只適用於經濟關係，也同樣適用安全領域。最後，本文藉由哥倫比亞內戰的案例，論證何以「人類安全」具備在判斷安全是否落實、因應全球化的國際局勢、回應「內部」威脅來源等三方面的優勢，用以彰顯安全概念宜從「國家」到「個人」之必要性。

關鍵詞：人類安全、內戰、安全研究、非傳統安全、傳統安全

* * *

壹、前言

安全研究 (security studies) 是國際關係的核心領域，①主導著該門學科的理论發

註① Terry Terriff, Stuart Croft, Lucy James, and Patrick M. Morgan, *Secur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 1.

展與許多相關議題的探討。安全研究本身又是個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領域，不僅包括歷史學、經濟學、心理學，還囊括軍事、政治、法律和科技等方面之內容。^②隨著冷戰之結束，國際關係邁入一個全球化的歷史新階段，此意謂著安全概念的轉化與安全研究的變遷。

傳統安全研究的主力係集中在「國家」這個唯一的指涉對象上，國家的生存優於一切，而其威脅源主要是來自於外部的軍事威脅。國家為確保其生存，無不設法追求軍力的增長，使得軍備競賽與安全困境成為無政府狀態中的常態。然而冷戰的結束與隨之而來的資源耗竭、環境惡化、疾病擴散、發展不均等非關軍事的問題日益尖銳，使得非傳統安全研究逐漸顯現其重要性，並被納入國家安全思考的範疇中。^③惟國家安全的研究雖因納入非傳統安全而在範圍上有所擴大，但並沒有放棄從國家本位的角度來思考安全問題，以致安全仍然只是國家的專屬，個人不是在討論中被邊緣化，就是遭受被忽略的命運。事實上，國家安全只是安全研究光譜中的一部分（見圖 1），其向右可延展至區域安全、國際安全，甚至是全球安全；而向左則可分解為社會安全（包括治安、金融、國土生態、司法制度等）與最基礎的個人安全。

以光譜的概念來看，國家安全應是奠基於國內的人民是否安全或未受到威脅。同時，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雖然大為降低，但某個國家內部政治和秩序的不穩定卻較以往更容易成為超越地理疆界的問題，最終威脅到國家以外的區域乃至於整個國際社會的安全。^④

冷戰的結束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促使安全的概念有所調整，傳統的安全研究因為侷限在軍事威脅，而無法回應當代威脅源多元化的趨勢。非傳統安全雖然掌握了各種非軍事性的新型威脅源，但未全然跳脫以國家為主體的安全思考，使得對於安全是否確切實現，或在國家未遭受威脅但國內秩序與人民生活卻苦不堪言的現象無法提出有力解釋。

本文在結構的安排上（除前言外），首先簡要地對既有安全研究進行回顧，指出「安全」本質上所具有的不可分割性；其次，討論國家成因與「安全」兩者間的關聯性，以說明「個人」安全的確保是國家形成與存在的前提；接著在回顧主流與非主流國關理論對於「個人」安全，即人類安全的研究文獻後，^⑤指出既有安全研究的侷限何

註②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eds.,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636.

註③ 王逸舟主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8~19；Robert Johansen, "A Policy Framework for World Security," in Michael T. Klare and Daniel C. Thomas, eds., *World Security: Trends and Challenges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p. 401~424.

註④ Lael Brainard, Derek Chollet, and Vinca LaFleur, "The Tangled Web: The Poverty-Insecurity Nexus," in Lael Brainard and Derek Chollet, eds., *Too Poor for Peace?: Global Poverty,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p. 14~20.

註⑤ 有關 human security 的中譯，一般有兩種譯法，即「人的安全」或「人類安全」。本文採用後者以求與聯合國中文版本之用語相符。

在；第五部分透過哥倫比亞內戰的個案，印證安全確實具有不可分割性，以及國家、個人、安全三者間關係的轉變如何使得「個人」在安全研究的重要性獲得提升；最後的結論指出，人類安全是對現有安全研究的一種修正與補強，對既存國家中心安全觀的反思，其貢獻在於彰顯安全概念宜從「國家」修正為「個人」之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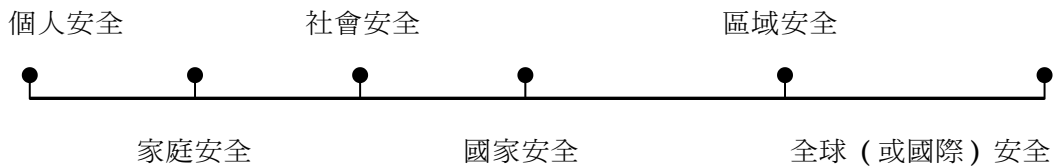


圖 1 安全研究的光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貳、安全研究的回顧

一、傳統安全研究

傳統的安全研究與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軍事安全 (military security)、戰略研究 (strategic study) 難以區分，使得安全研究被定義為一種「對威脅、使用和控制軍事武力之研究」。^⑥易言之，傳統安全將國家安全與軍事安全畫上等號。^⑦自 1943 年 Walter Lippmann 首次提出「國家安全」一詞後，^⑧國家安全幾乎成了軍事安全的同義語；^⑨直到 70 年代，安全研究的主題 (topics) 均著重在軍事面向，^⑩研究指涉對象亦仍以國家為主。這種對於軍事層面的重視，使得傳統安全在性質上與戰略研究相似，以致有學者將戰略研究與安全研究視為等同。^⑪漸漸地，人們開始普遍把以軍事安

註⑥ Stephen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1991), p. 212.

註⑦ David Mutimer, "Beyond Strategy: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New Security Studies," in Craig A. Snyder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pp. 82~84.

註⑧ 「國家安全」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的用語，Peter Mangold 在《國家安全與國際關係》一書中指出，美國是最早使用此一概念的國家。據他考查，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Walter Lippmann 在 1943 年的《美國外交政策》(U.S. Foreign Policy) 一書中首次使用。見：Peter Mangol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1~2.

註⑨ 傳統的國家安全概念與「國防」、「軍事」等定義相通，指的是保護國家免於受外來軍事攻擊與威脅。參考：Amos Jordan and William Taylo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Process*, revise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

註⑩ 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 (台北：時英出版社，2003 年)，頁 160。

註⑪ Joseph S. Nye Jr. and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1988), p. 7.

全為核心的安全觀稱為傳統安全，^⑫並將安全研究的層次拓展到國際，^⑬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的相關議題與研究也因而開始取得重要地位。^⑭

在傳統的安全研究中，國家是安全維護的核心指涉對象，因為對內，國家必須保衛其國民的生命與財產；對外，國家必須有足夠的能力防止其它國家或外來團體對其領土、政權或國民所可能造成的侵害。因此，國際關係學者，特別是現實主義者（Realists），認為國家是國際關係中最核心的角色，^⑮同時將安全理論著重於使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國家在安全問題上所面臨的「外部」威脅。簡言之，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軍事力量與其安全間呈現正比關係，若要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中獲得安全，國家就必須不斷增加與保持其在軍事方面的權力與實力。此種安全觀一方面強調國家的自身安全，一方面突顯出安全在獲得過程中的軍事性與競爭本質。毋寧，在傳統安全研究看來，國家間存有不可避免的衝突關係，安全是可以區分你我的、永遠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唯有權力的保持與擁有方可能讓自己在與其它國家的互動過程中，爭取或確保安全。^⑯

二、非傳統安全研究

冷戰結束後，國際整體局勢相較以往有了十分明顯的轉變，軍事事務的重要性被

註^⑫ William C. Banks and Jeffrey D. Straussman, "Defense Contingency Budgeting in the Post-cold-war World,"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59, No. 2 (1999), pp. 135-138.

註^⑬ Joseph Nye 與 John Garnett 認為「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是兩個不同概念，處於國家和國際體系兩個不同的分析層面，兩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國際安全是關於國際社會的安全」，John Garnett ed., *Theory of Peace and Securit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trategic Though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0), pp. 33-34；另外 Barry Buzan 則認為，國際安全是一個不發達的概念，在 80 年代之前缺乏完整概念與理論框架，且概念本身難以被定義；另外，其與權力的概念有所重疊。詳見：Barry Buzan,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 1991), pp. 3-4.

註^⑭ David A.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1995), pp. 117-141; Steven E. Mill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wenty-five: From One World to Ano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2001), pp. 5-39.

註^⑮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

註^⑯ Bernard Brodie, "On the Objectives of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 No. 1 (1976), pp. 17-36;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Kenneth N. Waltz, "A Strategy for the Rapid Deployment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5, No. 4 (1981), pp. 49-73; Steven E. Miller, ed.,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1990), pp. 5-56; Jeffrey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01), p. 131.

經濟議題取代，各國日漸頻繁的合作及往來，促使安全研究在方向上有所調整。^⑰研究者開始主張對安全的威脅源予以擴充，例如 1989 年 Jessica T. Mathews 提出環境議題與全球發展，要求擴展國家安全定義，將資源、環境、人口等議題納入；^⑱ 1991 年 Helga Haftendorn 呼籲各國多關注非傳統安全的一部分，包括經濟、生態、國家內部等多層面的安全威脅，^⑲渠等甚至提倡一種「真實地國際安全研究」(tru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要求研究者擺脫以往戰略思維的傳統安全觀。^⑳ Stephen Walt 甚至以「安全研究的復興」為題，^㉑指出安全研究在 1970 年代有了「引人注目的復甦」(dramatic resurgence)，在研究方法與理論上有更精進的成就。^㉒儘管 Walt 認為安全研究的核心應該是以「戰爭」研究為主軸，但也提及了非軍事議題的擴展，像是環境、貧窮、經濟等方面。^㉓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強調人類環境受到安全威脅的公共悲劇

註⑰ 1980 年之後，原本以軍事、戰略研究為核心內涵的傳統安全有了改觀：首先是 1983 年，Barry Buzan 從新現實主義出發，擴展了安全研究的指涉對象，Buzan 認為安全問題不再侷限於冷戰期間的軍事議題，還同時涉及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環境層面，此種將安全分領域而治之的論述，挑戰了軍事與戰略在安全研究中的主導地位，並闡明國家在軍事之外所要面對的其他威脅源。而 Richard Ullman 也在同年對軍事安全提出質疑，認為其傳達「事實的假象」(false image of reality)，導致國家忽視其他較危險或迫切的威脅，以及國際關係長期的軍事化(milita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反而增加全球的不安全。到了 1987 年，Joseph Nye 與 Sean M. Lynn-Jones 對安全研究領域提出若干檢討，包括安全研究自 60 年代後就少於創新、安全研究只是反映美國觀點、安全研究的結果受制於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等，點出傳統安全存在的癥結，進而促使傳統安全研究產生轉變。參考：Buzan, *op.cit.*, pp.19~20; Mutimer, "Beyond Strategy: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New Security Studies," pp. 79~81; Richard H. Ullman, "R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1983), p. 129; Steve Smith, "The Increasing Insecurity of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Stuart Croft and Terry Terriff, ed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ecurity and Change*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 73;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p. 119~120.

註⑱ Jessica T. Mathews,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2 (1989), pp. 162~177.

註⑲ Helga Haftendorn,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 Vol. 35, No. 1 (1991), pp. 15~16.

註⑳ Smith, "The Increasing Insecurity of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p. 78; Haftendorn,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 15.

註㉑ Stephen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1991), pp. 211~239.

註㉒ *Ibid.*, pp. 211~213.

註㉓ Walt 認為擴充安全研究至非軍事性議題，可能會破壞既有知識的連貫性，使得問題更加棘手和難以解決。見：*Ibid.*, p. 213；然而，「問題間等級之分的消失」現象，表明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逐漸增加。在全球化與相互依賴日形深化的時代，能源、環境、人口、衛生、糧食等問題與傳統安全中的軍事和領土爭端等議題處於同等地位，甚至可能更為重要或迫切。以環境領域為例，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不安全現象肇因於國與國間軍事對抗或領土爭端者較少，而來自環境因素或因環境因素促成之糾紛者較多。詳見：Michael Renn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World Watch Paper*, No. 89 (1989)；Norman Myers,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No. 74 (1989), pp. 23~41.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概念受到矚目，^㉔有學者因而將戰爭污染所導致環境安全威脅的直接暴力 (direct violence) 問題與國家安全相連結，^㉕環境安全的研究趁勢而起，豐富了非傳統安全研究的內涵與外延。

非傳統安全除了在研究範圍上拓寬了傳統安全，更進一步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修正，例如 Peter Katzenstein 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安全研究不應該只限於物質因素，社會文化因素亦有其重要性。他透過對傳統武器的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軍事性的人道干涉、軍事同盟 (如北約) 等傳統安全領域的問題進行經驗分析，進而證明，國際體系中的非物質性結構因素 (例如文化) 對於安全不僅有限制作用，而且還影響國家的安全認同與安全利益的形成。^㉖而前述提及的 Buzan，則是借助哥本哈根學派 (Copenhagen School) 中諸如 Ole Waever 的「安全化」(securitization) 論述，將安全視作一種社會建構，即安全的實踐主要是透過具支配性的話語 (discourse) 之社會化而獲得實踐。^㉗也就是說安全實際上具有國家與社會的雙重性質，^㉘而當軍事安全不再是唯一或主要的安全考量時，關於社會安全的新思維即成為必要，同時研究的範圍也必須拓寬。簡言之，非傳統安全研究中的哥本哈根學派在觀念上較為激進，認為安全研究無論在指涉對象、威脅源的探討等方面，均遠非傳統安全研究中的主體 (國家) 所能完整涵蓋，而應該是個多元交錯的複雜網絡，是一個不同行為體間相互運作與影響的領域。

總的來看，非傳統安全研究的貢獻在於促成吾人既有安全觀及思維的變革，雖然觀念上還未脫離主權國家，但至少展現出多元且富有包容性的特質。軍事安全從此只是安全領域的一部分，而國家也不再能獨享有關安全事務的發言和絕對的主導權。

註^㉔ 「公共悲劇」最初由經濟學家 Garret Hardin 於 1968 年在科學雜誌上發表題為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的專文時提出，按 Hardin 對公共 (the commons) 的定義不僅僅指公共的土地，還涵蓋公共的水域、空間等等。Garre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 (1968), pp. 1243~1248.

註^㉕ Daniel Deudney, “The Case Against Link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 3 (1990), pp. 461~476.

註^㉖ Peter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6.

註^㉗ Ole Wae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6~86;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7), pp. 23~31.

註^㉘ Ole Waever, Barry Buzan, Morten Kelstrup, Pierre Lemaitre, and David Carlton, eds., *Identity, Migr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 (London: Pinter, 1993) 轉引自: Michael C. Williams, “Modernity, identity and security: a comment on the ‘Copenhagen controvers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3 (1998), pp. 435~439.

三、人類安全研究

鑒於 90 年代冷戰結束後一系列國際情勢的改變以及政治觀念的進化，人類安全 (human security) 的概念因應而生，惟其內涵為何卻始終存有爭論，²⁹不同的國關理論、國家、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 (NGOs) 分別依據各自不同的理解，提出有關人類安全之定義與界定。³⁰概括而言，人類安全概念的提出與兩個現象有關，即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互賴的快速深化與軍事衝突類型的轉換。³¹就前者 (互賴) 而言，全球化意謂著風險與威脅伴隨著緊密的互賴關係而在全球擴散。過去導致對立或衝突的安全威脅，在重要性上將會被經濟互賴引發的新型威脅取代，就像戰爭對國家構成的威脅在當代已大為減輕，代之而起的是國家對能源供應、提供貸款國家或貿易往來夥伴國的依賴。依照 Wolfers 的觀點，安全在當代與其說是種難以釐清的概念 (ambiguous symbol)，不如說是種集體的設想 (collective imagination)；³²過往各國的安全在地理隔閡與科技不發達的限制下彼此分立，依靠強大的軍隊便能獲得有效的保障，如今地理和科技的限制解除，安全在國家彼此互賴的作用下成爲一種集體性的設想，除了難以分割，也無法單以軍事力量加以維繫。³³就後者 (軍事) 而論，冷戰後國家間爆發戰爭的頻率大幅減少，「戰爭」此項篩選國家的機制正逐漸喪失其功能，³⁴其影響是傳統安

註²⁹ 有學者認爲人類安全尚屬發展中的概念。詳見：盧倩儀，「發展中的『人類安全』概念及其在歐盟非法移民問題上之適用」，*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4 期 (民國 96 年 10~12 月)，頁 28。

註³⁰ 人類安全並非一種容易在內容上取得共識的概念，與此相反，它反映出不同的社會文化、地緣政治與歷史，以致有時在不同倡議者間是個難以調和的安全概念。而曾任人類安全委員會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共同主席的 Sadako Ogata 也曾指出，人類安全可能是一個包含廣泛或是根本一無所指的語詞。因此，難以給出一個精確的、能使各方都滿意的定義。故其建議強調人類安全概念的「工具性」意義，將其視爲一種「真實的需要」和「引導出實際行動的概念」。詳見：Edward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2, No. 3 (2001), pp. 239-251; Sadako Ogata, "Human Security: A Refugee Perspective," Keynote Speech at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on Human Security Issues of the Lysoen Process' Group of Governments, Bergen, Norway (May 19, 1999); Sadako Ogata, "Enabling People to Live in Security," Keynote Speech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 Security, Tokyo (July 28, 2000)。

註³¹ Gary King and Christopher Murray,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4 (2002), pp. 585-610.

註³²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in Arnold Wolfers, ed.,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147-165.

註³³ Attinà Fulvio and Zhu Guichang, "Security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Partnerships,"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5, No. 1 (2001), pp. 85-110.

註³⁴ J. J. Raitasalo, "Reconstructing War after the Cold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arch 2005), Hilton Hawaiian Village, Honolulu, Hawaii,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71257_index.html>.

全觀念中國家主權至上和領土完整等概念受到限縮。^⑤無政府狀態原本對國家生存造成的壓力在當代已大為減輕，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內部的暴力動亂，諸如內戰、族群分裂或尋求自決（self-determination）等新型態的安全威脅源。^⑥

從上述說明可知，對於人類安全是項概念的研究或分析可從不同層面加以解讀，它可以是被國家作為訴求的政治議題，或是單純視為一項新的研究範疇，也可以是對安全研究過程之轉變或調整的觀察。為了獲得最低程度安全研究學界的認可，本文以聯合國發展計畫署（UNDP）1994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所提出之人類安全概念為基礎。這份文件主要的關切點是將安全聚焦於人的本身及其生活範疇，而不再以國家作為探析安全的指涉主體對象。另外，雖然人類安全概念之正式系統性陳述是在上述文件中，但據作者觀察，在1993年的《人類發展報告》裡便已經提及此一思想，該年的報告指出，以人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需要新的五大支柱，其中之一為「新的人類安全觀」。此種安全觀強調的不僅是國家的安全，更關注「人的安全」。^⑦詳言之，此報告預示了冷戰後安全研究可能的發展趨勢，即從強調「國家」的安全到重視「個人」的安全、從透過武力確保安全到以合作和發展來實踐安全、從傳統對領土與政治權力的關注到對個人生存、社會待遇及環境等安全議題的關心。而這樣的轉變正是後來1994年報告內容中所論述之人類安全理念的實際範疇。在1994年的報告中，以「人類安全的新維度」專章系統地提出人類安全的概念。據其內容之論述，人類安全可從兩個方面來界定：一是所有人應免於受到長期的饑餓、疾病和壓迫；一是所有人應免於日常生活遭受干擾與破壞（無論是在家庭、工作，還是社群生活中）。^⑧報告進一步明白的指出，長期以來人們對「安全」此一概念的解讀過於狹隘，如免於外來侵略的領土安全、國家經濟利益的保護、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威脅下的國際安全等。但這些安全內容實際上與「人」的聯繫更為密切，他們才是第一線「不安全」的受害者，只是在以國家為安全主體的思維下，這些於日常生活中尋求安全的個人之應有關注被漠視。此外，對於大多數的人民而言，戰爭的侵擾並非每天發生與存在（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安全對每個人而言，其更實際的意義應是儘可能的免於疾病、失業、糧食稀缺和環境災害等事件造成的威脅與損失。毋寧，上述聯合國發展計畫署有關人類安全的報告內容透露出冷戰後安全研究應投入更多關注在國家內部之危及個人安全領域的衝

註⑤ 黃旻華，「主權國家的起源、演變與未來發展：時空因素的重要性」，*政治學報*，第38期（2004年12月），頁27-30。

註⑥ 可參考：Stephen Van Evera, "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8), pp. 257-291; David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Containing Fear: The Origins and Management of Ethnic Conflict,"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8), pp. 292-327.

註⑦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

註⑧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 23.

突事件，而不是持續獨厚於國家間領土的糾紛或外部軍事對抗。³⁹顯然，人類安全的核心主旨在於彰顯個人安全的重要性，認為個人的生存與基本自由沒有受到威脅時，社會與國家才能獲得安全，進而國際社會整體的秩序與穩定才能獲得維持。此種觀念和前述傳統安全或非傳統安全以國家為主要（或唯一）研究或分析對象的邏輯迥異。⁴⁰

考掘人類安全是項概念，其歷史溯源因不同學者判斷的認知基礎不同而有所差異，⁴¹本文著重在國際關係這門學科領域對人類安全概念的發展，因此時間上係自 20 世紀開始探討。首先，《聯合國憲章》以及 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的提出，讓人權、種族、性別、宗教等權利的保護獲得重視；接著在 1966 年，兩項重要人權公約的通過，⁴²使締約國有責任採取適當措施以貫徹《世界人權宣言》中的人類基本權利。⁴³上開這些文件構成所謂的國際人權法典 (Intl. Bill of Human Rights)，將維護人權的概念推廣為普世所接受的一項價值。⁴⁴至於比較具體的人類安全概念，以及該概念重要的倡議來源，應屬一連串由國家、委員會專家或學者、知識份子等提出的報告或相關文件。⁴⁵諸如羅馬俱樂部 (The Club of Rome) 發表一系列針對世界性問題 (World Problematique) 的書籍，⁴⁶並於 1972 年出版《成長的限制》報告書，⁴⁷要求人類必須採取立即行動調和與自然關係，才得以維持永續的發展機會。此外，80 年代兩個獨立的機構對人類安全概念的發展具有相當之貢

註³⁹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p. 22; 王崑義、蔡裕明, 「全球化、人類安全與後 SARS 時代：兩岸非傳統安全的新議題」, *遠景基金會季刊*, 第 5 卷第 2 期 (2004 年 4 月), 頁 156。有鑒於此，本文之後的案例選擇即以國家內部的衝突事件為例 (內戰問題)，於此先敘明。

註⁴⁰ 林碧昭, 「全球化與人類安全」, *人類安全與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研討會*, 臺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主辦 (2001 年 9 月 14 日), 頁 14。

註⁴¹ 例如有追溯到 17 世紀政治學中的契約論者，有將 17、18 世紀經濟學自由主義與人類安全做聯繫者，亦有藉啟蒙時代，強調個人自由與自主精神來討論者。詳細說明可參考：Gary King and Christopher Murray,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4 (2002), p. 2; Emma Rothschild, "What is Security?" *Daedalus*, Vol. 124, No. 3 (1995), p. 66。

註⁴² 分別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註⁴³ 請詳見網址：〈<http://www.ohchr.org/english/law/ccpr.htm>〉。

註⁴⁴ 請詳見網址：〈<http://www.unhcr.ch/html/menu6/2/fs2.htm>〉；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Now* (2003), p. 10,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http://www.humansecurity-chs.org/index.html>〉。

註⁴⁵ Kanti Bajpai, "Human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Kroc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No. 9 (2000), p. 5。

註⁴⁶ 羅馬俱樂部成立於 1968 年，為一全球性智庫，透過百名科學家針對全球糧食、人口、環境、科技發展等全球性問題發表報告和預測。可參考網址：〈<http://www.clubofrome.org/>〉。

註⁴⁷ 此書探討帶給人類和所有國家不安的一些複雜問題包括：資源耗竭、貧困、環境的惡化、對制度喪失信心、就業無保障、都市擴充缺乏管制、青年的疏離感、傳統價值淪喪、通貨膨脹，以及金融和經濟體系的混亂。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orgen Randers, and William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獻，他們分別是國際發展議題獨立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與裁軍與安全議題獨立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④1991年，斯德哥爾摩全球安全與治理倡議（Stockholm Initiative on Glob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開始呼籲一種更寬廣的安全研究途徑，建議安全領域進行擴充，以探討因發展失敗、環境惡化、人口急速成長和遷徙，以及欠缺民主政治所造成的不安全現象。^⑤而前述1994年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⑥則明確揭櫫了人類安全的七大類型，即：經濟（指工作上的基本收入有保障）、糧食（確保人人獲得所需糧食的充足供應）、健康（免於疾病和傳染）、環境（能夠獲得清潔水源、清新空氣及其它無污染的自然資源和未土質未惡化之耕地）、人身（免於受到肢體暴力與威脅）、社群（不同文化、宗教、種族、語言等權利的被尊重），以及政治（指基本人權與政治自由的保障）。^⑦並特別指出，人類安全是一「複合式概念，人們要有能力照顧自己，並有機會達成其最基本的需求」。^⑧此外，報告歸納出有關人類安全的四項本質如下：

- (1) 普世性：國不論強弱，人不分貧富，均是人類安全關注的對象，也均有人類安全的問題。蓋對於人類安全造成威脅的因素儘管有地理區域性之差異，但上述七類安全議題乃真實存在且日形明顯的安全挑戰。不同處僅在於個別國家遭遇的實際情況和不同項目的比重有別；
- (2) 互相聯繫：全球化下的時空壓縮效應讓某國、某地之人民安全受到威脅時，其它國家也均有可能被捲入其中。諸如饑荒、傳染病、軍火走私、種族衝突等，不再是受制於地理疆界的單一或零星國家的不安全，而是往往波及區域或全球的安全危機；
- (3) 預防勝於解決：以傳染病為例，一旦事先防治工作失敗，事後往往要花數倍

註④ 前者出版的所謂南北報告（*North-South Report*）書中，其委員會主席 Willy Brandt 指出：報告是依據最簡單之共同利益，意即人類需要生存，個人有要生存的道德責任。這不僅牽涉到和平與戰爭之傳統問題，也是如何克服世界飢餓、災難，以及貧富生活條件差距過大的問題。Kanti Bajpai 認為該報告指出南北發展問題核心，主要在於解決危機與緊張局勢，並替國家、區域、全世界人類提供有用的解決辦法。至於1982年的「裁軍與安全議題獨立委員會」，其出版的共同安全報告（*Common Security Report*）書，則提出有關和平與安全問題之其他選擇方式。儘管此報告之焦點仍然是軍事議題和國家安全，但它同時也承認第三世界國家所遭受到的貧窮與剝削，以及經濟不平等的威脅。此外，此份報告也指出：共同安全要求所有人類活得有尊嚴與和平、有足夠的糧食、工作能力，且生活在無匱乏的世界。Bajpai, "Human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p. 6.

註⑤ "Stockholm Initiative on Glob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1990's* (Stockholm: Prime Minister's Office, 1991) .

註⑥ 參閱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UNDP, 1994) ,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4/en/>>.

註⑦ 較詳細之解說可參考：宋燕輝，「『人類安全』之發展與推動：亞太國家的態度及作法」，人類安全與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研討會，台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2001年9月14日），頁26。

註⑧ 同前註，頁22-33。

的人力、物力與時間才「有可能」（而不是一定）將問題解決或抑制。反之，預防工作越早開始，甚至是平時就留心涉及疾病安全的細節（譬如建立人民良好的衛生習慣與就診模式），通常效果是較優的。2003 年中國 SARS 病情的爆發可為示例，其不但揭櫫以國家為中心之安全概念的缺失，更讓世人看到中共在病情爆發後必須仰賴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其它醫療團體的協助來解決問題。此現象有助於以人為主題的安全思考：

- (4) 以人為中心：當基本人權的維護已成爲國際社會一項普世的價值時，每個人爭取較好生活條件與健康環境的權利應受到肯定與尊重。國家本是由一群具有主觀意識的個人所構成，兩者之間何者爲主、何者爲從？在當代以民主政治爲核心的社會科學中是不辯自明之理。⁵³

四、小 結

本部分簡要回顧了安全研究的歷史及其主要內容，說明安全研究儘管在討論範圍上從早期傳統的軍事安全擴充到非傳統之軍事領域以外的安全，譬如經濟、貿易、發展，以及資源等。但其關切的主要對象還是以國家爲重點。作爲國家基本組成要素的個人，在安全研究的討論中多半被邊緣化或忽略。特別是傳統安全相信個人的安全是以國家安全作爲前提，他們的安全由國家安全所吸收，毋庸另行特別給予關注或探討。然而，以人爲本的人類安全，其核心在於強調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面臨的新威脅源有哪些，這些威脅源雖非直接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但卻對個人、家庭、社會等構成國家重要基礎的單元形成直接侵害，⁵⁴並在相當時間的積累和醞釀後，對國家安全造成難以回復的危險。⁵⁵易言之，冷戰後國際情勢的轉變，特別是全球化的現象，讓不同安全威脅源之間的比重有所調整，戰爭相較以往已喪失對國家構成生存威脅的能力，代之而起的是其它的威脅型態，它們直接侵害的對象往往不是國家而是個人。準此，人類安全的核心精神在於追求普世與平等性的安全，也就是無論平民百姓、富商巨賈、皇親國戚均適用的安全論述與主張。表面上來看，人類安全的指涉對象是次於國家、社會等分析層次的「個人」。但實際上，此處的「個人」不是單一針對性的概念，

註⁵³ 所有的政治都是始於地方（All politics is local）；而地方政治又是民主制度得以實現的基礎。故而回到以人爲本的立場來思考國際關係中的安全問題，應是值得鼓勵與嘗試的研究途徑。參考：莊雅仲，「民主化及其不滿：被動革命、民族主義與反抗的政治」，收錄於台灣歷史學會編，*邁向 21 世紀的台灣歷史學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 年），頁 175-205。

註⁵⁴ Edward Page, "Theorizing the Link Between Environment Changing and Security,"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9, Issue 1 (2000), pp. 33-43.

註⁵⁵ 除此之外，也不排除對國家以外的其它行爲體（如國際組織）或個人造成安全上的侵害。例如 2008 年聯合國派駐在達弗的混合維和部隊（UNAMID）便因遭受當地武裝勢力的攻擊而有人員傷亡。詳見：“Sudanese army elements attack UN convoy; Ban Ki-moon protests,” via at: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25231&Cr=Darfur&Cr1=>

例如不是指某個身份的「誰」、不是指某個團體中的「誰」、不是指某個國家中的「誰」。人類安全所指的「個人」是全世界現所活著的「每一個個人」，任何安全事項只要是符合這每一個個人的需要（而不是少數個人的需要），就是人類安全所要研究、分析與探討的對象。⁵⁶

相較之下，傳統安全的範圍窄化許多，它的指涉對象限於國家，它的研究對象限於軍事。所以如此與其相關概念形成的歷史時空背景有關，在此不擬探究。至於非傳統安全可視為學界將傳統安全研究拓展至人類安全研究的「橋樑」(via media)，其不僅是擴大了傳統安全研究在議題上的廣度，在分析層次上亦修正了傳統安全僅關注國家層次的缺失，開始朝向個人或社會層次的討論，惟其對於「個人」因素的關注並不足夠。

參、國家與「安全」

既有的安全研究成果顯示，國家與安全兩者間的關係是如此的緊密，前者成為後者指涉和討論的核心關切。鑒此，本部分對兩者關聯性進行探討，以助於吾人對安全更為深刻的理解。

一、國家的形成

關於國家起源的探討甚多，研究者因為各有側重，因此提出的解釋也不盡相同。⁵⁷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國家的形成並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時空因素。以下試從「自發」和「壓力」兩個角度切入進行探討。

西方若干著名的神權論者（如 Thomas Aquinas）和以 Karl Wittfogel 為代表的水源論是國家自發形成的支持者，他們相信人在神的眷顧下有組成國家的自然天性，或是人們在歷史的某一時刻，會理性並自願地放棄原本個人權力，與其他群體結合起來形成政治單元。⁵⁸自發論有一明顯的疏漏，即沒有辦法解釋個人何以在欠缺外部壓力的情況下會自動地放棄他們原有的權力。研究也同時指出，人類歷史上難以發現一個國家的形成是可以單獨透過自發論來解釋的。⁵⁹西方哲人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或許可算是國家自發形成說的主張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以人類實現「至善」的角度來進行

註⁵⁶ Matt McDonald, "Human Secu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Globa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3 (2002), pp. 277-295.

註⁵⁷ 本文所以論及國家的形成係為了說明它與「安全」的關係，而非欲究竟國家形成的根本原因。

註⁵⁸ Ronald Cohen and Elman Service,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8); Karl Wittfogel, "Hydraulic Civilizations," in W. L. Thomas,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p. 152-164.

註⁵⁹ Robert L. Carneiro,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Vol. 169, No. 21 (1970), pp. 733-738.

論述。在他的政治學中，人爲了實現生活的目的，而組成家庭、村落、城邦、國家。這一系列的過程雖是自然決定的，而非個人意志使然，但國家作爲人追求最高至善目標的社會集合體，是爲了保障個人的物質生活免於干擾（壓力）。^⑥

贊同「壓力」才是形成國家原因的主張者可因其強調的壓力類型不同而分爲四種，即戰爭說、人口說、經濟利益說、綜合說。^⑦惟無論何者，皆與資源的短缺和分配有關，^⑧也就是資源使用上的競爭與衝突會促使個人形成群體性的社會結構，由其承擔重分配的職能。關於此種重分配的職能，Anold 認爲，是反映個人期許國家組成後能有效解決資源有限情形下的衝突問題，因此國家形成後若無法將資源有限的壓力予以舒緩，讓個人意識到必須遵循國家在資源使用上的安排，不然自己的生命將不保時，國家的權威與存在便會受到挑戰。^⑨學者 Tainter 則是從經濟的面向切入，認爲國家重分配的職能如果在執行上有不公正的現象，例如將較多的資源用於祭祀、上層階級的消費，而不是提供給組成國家的人民時，國家的解體就不可避免。^⑩

在「自發」與「壓力」之間，還有一種觀點是從人性和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出發，解釋國家的形成。例如 Kant 與 Hobbes 認爲，人爲了脫離原始的戰爭狀態，會透過理性形成公民社會或巨靈（國家）。^⑪本文認爲，此種說法實際上仍與「壓力」有關，蓋人所以爲了脫離戰爭狀態，是因爲希望能保有他們的生命和財產，使之免於外來壓力的干擾或威脅。^⑫

二、國家的形成與「安全」

簡要回顧關於國家形成的理論後，吾人可以發現國家的形成通常伴隨特定的目的。這種目的可能是個人追求至善的結果，也可能是爲了確保對特定資源的使用。^⑬惟無論何者，客觀上某種壓力的存在讓個人必須採取回應，而回應的結果往往是一種社

註⑥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出版社，1981年），頁10、53-54、182。顯然亞里士多德不否認國家形成的背後有其目的性存在。

註⑦ Robert L. Carneiro,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Menlo Park, CA: Institute for Humane Studies), No. 3. (1977), pp. 3-21.此文係 Carneiro 將先前在 *Science* 期刊中的研究更形深化的學術作品，對「壓力」導致國家形成提出更爲全面的闡釋與數據資料。

註⑧ 不同處在於，前三說係採取單一變量的假設進行理論推演，故無法做出通則性的解釋。而綜合說考量了多種壓力因素，並將國家界定爲一種具有地域性的政治組織和等級社會。詳見：Robert Adams,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註⑨ Jeanne E. Anold, "Labor and the Rise of Complex Hunter-gatherer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Vol. 12 (1993), pp. 75-119.

註⑩ Joseph Tainter,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註⑪ H. B. Nisbet,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8.

註⑫ William R. Lund, "Tragedy and Educatio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Hobbes on Time and the wil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8, No. 3 (1987), pp. 393-410.

註⑬ 是否追求「至善」較難證明，因爲這個概念缺乏一個明確的界說，同時可以作爲任何行爲的藉口。相較之下，國家對於「資源」的保護，甚至不惜發動戰爭的實例卻履見不鮮。量化研究資料可參考：Kalevi J. Holsti,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07-310.

會群體模式的形成。這種群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可能有不同的名稱，其中以「國家」最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意義，但其功能必然包含對個人期待的滿足，更清楚地說，一個國家的形成必須要讓其組成份子的生活，特別是在資源的享用權利上，比他們原本獨自面對問題時有更好的安排。^⑧如果無法滿足這樣的期待，則國家的存在就是背離其目的與價值，衰敗或崩毀將是遲早之事。以今日國際社會普遍的觀點來看，則國家的功能就是為其人民提供安全上的保護，讓他們安居樂業，無所顧忌地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模式。倘若一國的政府在功能上喪失提供這種「安全」的能力，則人民理論上可以透過民主的秩序將不適任的政府淘汰，或是訴諸更激烈的暴力革命方式進行國家改造。^⑨另一方面，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作為核心意識的全球化，更進一步將世界推向一個單一體，並在某程度上弱化民族國家（nation-state）原有的角色、權力與功能，同時穿透政治或地理上的疆界藩籬，加速國家間往來交流的便利性，同時促成世界性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⑩催生許多國家的政府進行改革，其結果是國家的定位逐漸朝向提供人民服務的「代理人」角色，而不是具有政治高權的「統治者」。^⑪

肆、國關理論對「個人」安全的分析： 主流與非主流^⑫

一、主流理論對「個人」安全的觀點

主流國關理論針對於「個人」安全的研究資料不多，此與現實主義在安全研究中

註^⑧ 國關學者 Holsti 的研究顯示，在民族國家出現的前近 200 年間（1648-1814），為了資源和經濟因素而發動的戰爭比例接近 50%，詳見：*Ibid.*, pp. 311-312。可見國家形成的原因與個人對於資源的使用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類似的研究結果可參考：Robert Morley and John Marwitt, "Ecology, Economy, and Warfare in Lowland South America," in Martin Nettleship, ed., *War: Its Causes and Correlates* (Hague: Mouton, 1975), pp. 440-450.

註^⑨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1986), pp. 1153-1155. 當然，人民對不適任政府的反抗未必一定成功，在極權專制國家，此種成功可能性則更低。

註^⑩ Seyom Brow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System: Toward a Theory of World Poli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註^⑪ Ali Farazmand,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59, No. 6 (1999), pp. 509-522.

註^⑫ 有關主流與非主流論述部分請參酌：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1989), pp. 235-254; Emmanuel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 (2001), pp. 611-625; Steve Smith, "Positivism and Beyond,"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44; Scott Burchill, "Introduction," in Scott Burchill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pp. 1-26.

占有主導地位有關。現實主義對於個人解放才能獲得真正安全的論述不以為然，認為若將安全與解放連結，將會有本質上的危險，如同一旦給予第三世界國家中的族群享有自決的權利時，將會對其國內穩定造成風險。^⑭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雖以人性本惡作為安全分析的基點，但其目的是為了將個人對權力的貪婪套用在國家，進而說明國家將權力視為追求的目標和界定利益的基礎，而權力平衡和結盟則是實現其目標與利益的主要手段。^⑮相較於古典現實主義對於權力的著重，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側重於「安全」，認為國家對外交涉的立足點是如何維繫生存而非如何將權力最大化，^⑯因此深化了對安全的研究，以體系結構作為解釋國家行為的基礎，並將權力平衡作為維繫國際秩序的有效方法和行為準則。^⑰惟新現實主義是一種結構理論，關注於國際體系是否因為國家間權力的消長（特別是軍事權力）而發生結構性的改變，也就是說，國家是新現實主義分析的唯一對象，個人及其安全是國內層次的問題，對於國際體系的結構不具有影響力，故而遭到被忽略的命運。

自由主義有關「個人」的探討，可追溯到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雖然多數國關理論不認為個人是國際社會的行為者，但古典自由主義則主張個人應該作為任何社會理論的基礎，因為只有個人才是真實的。^⑱例如 Adam Smith 認為，人的行為大多出於自私的動機，個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時，會間接帶動社會的福利，故而自利的個人在市場機制引導下可以有效配置資源，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政府不該干預人民的經濟活動。^⑲至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對個人的分析與研究較少，不

註⑭ Andrew Linklater,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Human Security," in Ken Booth e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 p. 121.

註⑮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p. 1-15; 187.

註⑯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1979), pp. 114-115;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5;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7-118; Kenneth A. Oye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rles L. Glaser, "Realism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50-90.

註⑰ 譚偉恩，「權力平衡的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 22 期（2006 年 7 月），頁 129-166。

註⑱ Diana Panke and Thomas Risse, "Liberalism," in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0-91.

註⑲ Bronowski and Brace Mazlish,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0), p. 352.

過在民主和平論 (democratic peace theory) 方面，⁷⁹則指出具有共同觀念和規範的國際制度，將使民主國家之間傾向採取和平競爭的方式以達成政治妥協，並解釋國際制度與國家內部民主關係的重要性，強化了民主認同與人權觀念。⁸⁰

二、非主流國際關係理論

(一) 建構主義

在 90 年代初開始興起的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是由批判理論等非主流國際理論與主流理論的辯論與對話中所建立起強調社會互動與共構風格的理論學派。代表學者如 Nicholas Onuf 觀察到冷戰後國際關係的變化，指出主流國際理論將個人排除在外，但是建構主義視個人及他們的社會活動為分析國際關係 (包含安全議題) 的關鍵。

與主流理論著重物質結構決定個體行為的觀點不同，建構主義重視社會活動及其背後的思想與文化作用，強調社會 (含國際社會) 是人們通過實踐建構起來的。簡言之，建構主義的理論要旨在於，人是社會人 (social beings)，沒有社會關係就不成為「人」，或者說，社會關係使人們成為過去與現在的我們。人建立了社會，社會也孕育了人，兩者是相互連綿不斷的建構過程。⁸¹ Alexander Wendt 則試圖重新詮釋無政府狀態的文化內涵，以突顯出國際社會中的非物質現象。⁸²他認為社會結構是一種動態的互動過程，而非先驗與靜態的存在，透過行為單元 (agents) 彼此的互動，可以建構出共有的知識或期望 (shared knowledge or expectation)，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自己與他人，產生新的認同或規範，最終對既有的觀念，如權力、安全等議題產生結構性的改變。⁸³

總的觀察，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偏重觀念的作用，認為物質本身是沒有社會意義的，只有在行為單元彼此的社會互動過程中才能產生作用。準此，「安全是被建構的，

註⁷⁹ 1983年 Michael Doyle 將民主和平作為一種理論提出，見：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y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3 (1983), pp. 323-353；另外 1993年 Bruce Russett 對民主和平作了系統論述，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⁸⁰ John Macmillan, "Whose Democracy? Which Peace? Contextualiz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 41 (2004), pp. 472-493.

註⁸¹ Nicholas Onuf,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1998), pp. 58-63.

註⁸² 社會建構論其所著重觀念的形塑，從「共有知識」(shared knowledge)、「物質性因素」(material resource)作用，到不斷社會實踐 (practice) 的結果。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 (2001 年夏季號)，頁 231-264。

註⁸³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41; 246-248.

威脅的認定可能會改變」。⁸⁴由於人類安全挑戰了安全概念中的正統（orthodox）概念，反映出多元且不同的社會文化與互動過程，衝擊原本國際關係的既定（the given）價值與規範，故頗適合以建構主義作為理論依據。⁸⁵ Onuf 便曾指出，建構主義是研究社會關係的新方法，而其出發點是「人」，在人與社會間加入了規則（rules），並將人與社會聯繫起來。⁸⁶

（二）哥本哈根學派

90 年代末 Buzan 吸收前述建構主義的部分觀點並將之與哥本哈根學派結合，⁸⁷提出將物質主義與社會學方法結合起來的新安全研究模式。此模式中兩個關鍵變數，即物質面向的體系極性（polarity）和非物質面向的觀念與認同。所謂極性，是假定國家能力的分配將深遠地影響體系內行為體的行為；而觀念與認同，是假定行為體透過彼此的互動與聯繫後，會開始思考他們的身份及進一步建構彼此的認同。在具體運用上，Buzan 將極性置於社會的框架之內，假定存在一個擁有共同規則或規範的國際社會存在，且該社會本身是動態與開放的。在此假設之下，國家間物質力量的分配和權力政治的運作邏輯，並不會如同結構現實主義那般永遠呈現體系結構制約個體行為的結果，而是社會結構有時與權力政治的邏輯運作相一致，有時則會削弱之。簡言之，以極性為主體的結構在實際上必須以涵蓋它的國際社會為基礎來理解和詮釋，而國際社會的屬性究竟是成熟的無政府狀態（mature anarchy）還是不成熟的無政府狀態將因體系成員實際的互動與聯繫而有所別。⁸⁸在本體論方面，Buzan 從強調物質主義面向的軍事安全研究轉向以觀念和認同為主的非傳統安全研究，同時在安全的指涉對象上從國家主體修正為以人為主體。⁸⁹因為 Buzan 認為，當軍事安全不再是唯一的安全考量時，關於安全的新思維即成為必要，同時安全研究的議程也必須拓寬。簡言之，當代的安全研究無論在指涉對象、威脅源的探討等方面均遠非傳統安全研究中的主體，即

註⁸⁴ Steve Smith, "The Self-mages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Twenty Years," p. 87.

註⁸⁵ Edward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2, No. 3 (2001), p. 232.

註⁸⁶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a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 E. Shapre Inc., 1998), p. 20.

註⁸⁷ 哥本哈根學派認為「安全」是一種社會建構下的產物，是一種特殊的政治現象。個人、群體或國家往往透過將「存在性威脅」提升到安全事務的安全化過程，讓安全無限制的被擴張。因而，該學派反對無限制地擴展安全的外延，轉而以「非安全化」的訴求去逐步實現人類社會的和平。在操作層上，哥本哈根學派反對以軍事和國家為中心的傳統安全研究方法，而主張透過探索對安全指涉的威脅以及那些威脅的安全化，建構出能適用於軍事領域與非軍事領域的安全研究。巴瑞·布贊（B. Buzan）、奧利·維夫（O. Waever）、迪·懷爾德（J. de Wilde）著，*新安全論*，朱寧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6。

註⁸⁸ Barry Buzan,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9-80.

註⁸⁹ Bill McSweene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8.

國家所能完整涵蓋，而是一個多元交錯的複雜網絡，是一個不同行為體間相互運作與影響的領域。^⑩ Ole Waever 則是提出「安全化」(securitization) 的概念，主張將安全視作一種社會建構，即安全的實踐主要是透過支配性安全話語之社會化而獲得實踐。^⑪ 故而，安全實際上包含了國家與社會的雙重性質，而哥本哈根學派有意將安全轉向以社會為中心的思考。

另一方面，Buzan 將哥本哈根學派安全研究的概念與區域安全複合體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的概念進行結合，主張安全概念應該比權力概念更為多變 (versatile) 與具有穿透力 (penetrating)，^⑫而非如傳統安全研究專注於軍事安全的討論。^⑬ Buzan 因此將安全研究分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和環境等五個領域，藉此充實了安全研究的指涉對象，即個人、社群、國家、區域、國際等不同的層級。每個指涉對象並非互相獨立，而是彼此屬於互相牽連的安全概念。^⑭ 在不同層級當中，Buzan 對於區域安全研究投注了心力，認為傳統安全研究對區域安全事務缺乏一套完整的分析架構及途徑，因此，他希望藉由「安全複合體」的概念，進行與分析區域安全秩序的建立和發展。在其 2003 年與 Waever 合作出版的區域與權力：國際安全的結構一書中，便進一步就哥本哈根學派的新安全觀以及區域層次之安全複合體概念進行詮釋，將安全複合體發展為能廣泛適用於各區域之安全理論，強化了國家安全的社會性。^⑮

(三) 批判性安全研究^⑯

鑒於傳統安全研究所強調的國家中心、維持現狀 (status quo)、軍事威脅等過於偏狹的安全價值已未能符合當代國際關係的發展和需求，^⑰批判性安全研究者主張延伸性安全 (extending security) 的概念，也就是將安全的指涉對象從國家延伸到個人，強調安全在內涵上的多樣性，不能僅限於特定的主權國家，也應該從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中去理解，國家儘管在提供安全的功能上有其重要性，但安全最終只有在涉及個人時，才會彰顯出意義與重要性。^⑱ 例如 Ken Booth 便認為安全就是追求解放

註^⑩ 巴瑞·布贊等著，前引書，頁 52。

註^⑪ Wae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On Security*, *op. cit.*, pp. 46-86.

註^⑫ Buzan, *People, State and Fear*, *op. cit.*, pp. 2-3.

註^⑬ *Ibid.*, pp. 14-15.

註^⑭ *Ibid.*, pp. 19-26.

註^⑮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7-43.

註^⑯ John Mearsheimer 視批判理論為後冷戰實踐和平方式中最具野心的一派，因為批判理論直接挑戰現實主義有關「自利」(self-interested) 的國家行為。此顯示出批判安全研究所產生的影響不可忽視，也表明批判理論已成為國際關係理論中另一支重要的力量。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95), pp. 14-15.

註^⑰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op. cit.*, p. 318.

註^⑱ *Ibid.*, pp. 313-326; Ken Booth, "Security in Anarchy: 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3, No. 3 (1991), pp. 527-545.

(emancipation)，唯有解放才能讓個人得到真正的安全，人一旦能從社會、經濟、政治等限制之中獲得解放，安全就有機會被真正的落實。而 R. B. J. Walker 則指出，安全研究似乎習慣與菁英和政府的利益保持聯繫，而不是與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進行對話，導致安全概念經常是與「國家的公民」，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眾或人民」聯繫在一起。但真正的安全主體只能是人民，而非國家、政治菁英、經濟強者或權力擁有者。⁹⁹ Walker 進一步提出世界安全的觀念，並以此觀念向傳統國家中心的安全研究提出質疑。他認為，雖然世界的安全與國家的安全密不可分，因為國家主權仍係支配世界政治的核心概念，但以國家作為核心的安全意識和其派生的政治認同，導致必須以其他國家或政治集團的不安全為代價，從而衍生族群衝突、宗教對立、恐怖主義、南北問題、性別歧視、科技對自然的剝削等危及安全的現象，並迫使人們去從事「我群」與「他群」的區別認同，造成對立與不安全的結構性循環。¹⁰⁰

(四) 女性主義¹⁰¹

質疑傳統國際政治與國際安全充斥著以男性觀點為主的論述，女性主義 (Feminism) 以社會性別 (gender) 作為分析國際關係的新方法，批判國際關係是男性固有的領域和與女性無關的二元對立說。¹⁰² 代表學者如 Ann Tickner，批評安全始終被視為男性議題 (masculine issue)，應將安全內涵從軍事面向擴展到非軍事議題，例如環境、經濟等層面，讓女性和其它社會底層所遭受的不安全獲得重視與研究。¹⁰³ 在理論內涵上，女性主義部分援引了批判理論、建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Marxism)，另加上歷史學 (Historiography) 和人類學 (Anthropology) 的研究方法，¹⁰⁴ 但由於女性主義以批判的角度來突顯既存國際關係的失衡與不平等，使得女性主義的理論解釋在效度或信度受到質疑，在理論建構的過程中，並沒有擺脫國際關係領域的邊緣地位。¹⁰⁵ 不

註⁹⁹ R. B. J. Walker, *One World, Many Worlds: Struggles for a Just World Pea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8), pp. 119-128.

註¹⁰⁰ R. B. J. Walker,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litics," *Alternatives*, Vol. 15, No. 1 (1990), p. 27.

註¹⁰¹ 女性主義與安全論述有關的文獻，可追溯到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召開於海牙 (Hague) 的國際婦女大會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 所通過的一項決議，認為裁軍是確保未來國際持久安全與婦女人身自由的有效途徑。Jane Addams, Emily G. Balch and Alice Hamilton, *Women at the Hague: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 and Its Resul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Preface.

註¹⁰² Christine Sylve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6-99.

註¹⁰³ J. Ann Tickner, "Re-visioning Securit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 190.

註¹⁰⁴ Charli Carpenter, "Gender Theory in World Politics: Contributions of a Non-feminist Standpoi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2002), pp. 153-165.

註¹⁰⁵ 王文，「超越兩分法：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前途」，*國際觀察*，第 2 期 (2005 年)，頁 39-45。

過，女性主義在性別、貧窮、職場歧視、戰爭，以及生態破壞等方面的研究貢獻，已促使安全研究更為周延與完整。¹⁰⁶

三、既有理論的缺失

總括上述介紹之諸理論，古典現實主義雖有談論個人，但目的在於借用人性解釋國家的行為，對於個人安全的部分則是呈現討論空白。相較於古典現實主義對於權力的著重，新現實主義側重於「安全」的相關研究，然受限於兩極對峙與恐怖平衡的客觀國際時空因素，它的安全研究只著重在結構因素與軍事安全，對於個人安全的探討採取忽略的做法。

古典自由主義雖然主張個人應該作為社會關係的基礎，但因發展歷程中受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過度強調自利和財富累積，使得安全被侷限在經濟事務；而新自由主義雖然強化了民主認同與人權觀念，但因將焦點置於國際制度和國家間的合作問題，以致關於個人安全的研究成果付之闕如。

最後，非主流理論中的建構主義、哥本哈根學派、批判性安全研究和女性主義，雖有別於主流國際理論，轉而重視非物質因素或是國家以外之社群或個體的作用和重要性，讓個人安全的討論得以進入安全研究領域。但因為他們過於著重反思和解構的工作，較少提出替代或改良既有安全研究缺失的方案，導致難以擺脫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的邊緣地位。¹⁰⁷

伍、人類安全概念的檢證

簡要回顧安全研究的現況與相關理論後，本文發現，傳統安全將威脅源侷限於軍事面向的缺點可透過後來非傳統安全在研究範圍擴大上的努力獲得補足。但因為兩者實際上仍是以國家為重，使得研究成果本身無法有效因應全球化時代安全概念的轉變。詳言之，當威脅國家安全的因素不再是外部敵人所發動的戰爭，或是威脅源不再直接針對國家進行侵擾時，從傳統安全或非傳統安全的角度來看，「安全」的任務與目標似乎已經達成。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何以當代國際整體的安全或是許多國家內部的安全依舊或多或少存在著不穩定或受侵擾的現象？人類安全概念的提出和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2001 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2003 年 SARS 疫情爆發與南亞大海嘯等相關事件的發生，或可為此問題提供

註¹⁰⁶ J. Ann Tickner and Laura Sjoberg, "Feminism," in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93. 譚偉恩，「女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國際關係學報*，第 23 期（2007 年 1 月），頁 141~142。

註¹⁰⁷ Harald Mülle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 385.

解答的方向。

當代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對以國家為主體的安全研究形成挑戰，一方面安全威脅源的多樣化和快速增加讓傳統安全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功能上出現漏洞；另一方面威脅源的來源已不再侷限於外部，國家內部也可能產生威脅自我安全的威脅因子，同時各種威脅源襲擊的對象也不再針對國家。這使得非傳統安全即便掌握了所有安全威脅源，也無法準確判斷不安全的現象發生於何處，以及何時此種不安全會波及到國家。面對此種困境，本文認為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觀有必要加以修正或調整。¹⁰實際上，安全概念就像一道不可分割的光譜（見圖 1），儘管由左至右可以歸結出許多不同面向，但當其中一個安全面向受到影響時，其他面向也會受到波及，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時代更是如此。毋寧，互賴現象不是只適用於經濟關係，安全領域也同樣適用。但在偏向以國家作為主要指涉對象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研究中，表面上非關國家的重要安全考量被邊緣化，以致造成安全落實上的矛盾。本部分承接前述有關國家與「安全」關係的討論，藉由內戰的案例說明安全的不可分性和人類安全在判斷安全是否落實、因應全球化的國際局勢、回應「內部」威脅源等三方面的優勢，彰顯安全概念應由「國家」中心修正為「個人」中心之必要性。

一、人類安全與「當代戰爭」的關係

當代國際關係中的戰爭與傳統安全中所研究和分析的戰爭在性質上已有所不同，特別是在淘汰國家的篩選功能部分。詳言之，冷戰前的戰爭多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國家雖然作為一個抽象的社會集合體，卻是戰爭衝突中的基本單元，它的生存與其內部人民的安危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正因為如此，國家安全成為早期安全研究的核心關切，而個人安全在覆巢之下無完卵的觀念中，順理成章的居於次要，甚至在某些時刻被視為應當為國家安全做出犧牲。

相較之下，戰爭的型態或性質在冷戰結束後與過往有了很大的不同。當代的戰爭多屬一國領域「內部的」武裝衝突（俗稱內戰），而不是國與國之間的相互武力行使。

註¹⁰ 調整的方向便是從「國家」到「個人」。相同觀點可參考：Hans Van Ginkel and Edward Newman, "In Quest of Human Security,"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4, No. 1 (2000), pp. 59-82. 聯合國安理會和相關的附屬機構已陸續提出與人類安全相關的議題、議程和討論，各式各樣以人類安全為主題的研討會也在世界各地召開。國際社會透過加拿大、日本等國的努力，陸續成立與人類安全有關之機構。例如 1999 年 3 月，在日本政府提議與經費資助下，聯合國人類安全信託基金（the 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在美國紐約設立。參考：Yukio Takasu, "Toward Effective Cross-sectoral Partnership to Ensure Human Secur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Third Intellectual Dialogue on Building Asia's Tomorrow, June 19, 2000, Bangkok,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 <http://www.mofa.go.jp/policy/human_secu/speech0006.html>. 1999 年 5 月由加拿大倡議與十一國共同成立人類安全網絡（Human Security Network），並於 2001 年在美國紐約成立了人類安全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目前會員共有瑞士、奧地利、智利、希臘、愛爾蘭、約旦、馬利、荷蘭、挪威、泰國、哥斯大黎加，以及斯洛維尼亞。參考：<<http://www.humansecuritynetwork.org>>.

此種戰爭類型除了交戰雙方為爭取政治權力或國家治權之外，更有可能是基於其他特定利益使然，當中較為一般人熟知者係販毒交易和軍火走私。此種基於特定利益而存在的內戰，當事方往往因為必須藉由國家局勢的不安定來獲取經濟收益，因此幾乎不會有停戰或恢復和平的打算。其結果就是內戰發生國的國內秩序將長期處於混亂和動盪，人民雖然無亡國之虞，但卻可能過著與亡國無異，甚至更為艱辛的苦難生活。

另一方面，對國家而言，此種長期的內戰狀態不但嚴重妨礙其經濟發展，更衍生出許多負面性的後果，例如失業率增加、教育難以普及、犯罪率攀升、社會福利水準下降、環境或衛生品質惡化，以及大量流離失所的難民產生等。而這些負面後果皆是人類安全七大項目所關切並擬消除的對象。簡言之，由於人民的個人安全無法獲得落實，使得發生內戰的國家整體功能運作陷於停滯，而停滯的後果進一步深化人民對國家信心的缺乏和反感，使得從事內戰的當事方團體獲得成長的空間與機會，如此惡性循環永無止息，甚至進而對區域或國際安全造成衝擊。

為更清楚的說明當代戰爭如何與人類安全密切相關，以下援引哥倫比亞（Colombia）內戰的事例進行說明。在此之前，先簡要地將「當代戰爭」較之傳統戰爭或是單純政治權力爭奪的內戰之不同處，敘明如下：

- (1) 相較於傳統戰爭，當代戰爭一方面發動的成本較為低廉；一方面對國家受到的創傷較低（戰爭對國家生存的安全不再構成直接威脅）；
- (2) 失序（chaos）成為追求的目標；當代戰爭中交戰雙方通常會避免決定性的殊死戰發生，取而代之的是以攻擊平民百姓為主要的軍事任務。其目的乃係為延續國內局勢的持續動盪，以利於自己特定利益的取得。簡言之，國內秩序的穩定不符合交戰各方的利益；^⑩
- (3) 因為發動戰爭的成本較過往低廉，同時衝突狀態的維持有益於交戰當事方，導致此種內戰不易受到制約。除非國際社會持續有效的介入干預並採取若干強制性措施，否則戰事往往經年累月。
- (4) 當代戰爭所造成的危害與影響，一旦反映在人類安全的七大項目中時，其影響是從對個人的直接暴力到整個社會結構的間接暴力，使得用以區分安全的環節儼然喪失判定的功能。

二、案例說明：哥倫比亞內戰

國家發生內戰的事例甚多，本文所以選擇哥倫比亞內戰作為檢證立論的個案係基於以下的原因：（1）哥國內戰在時間上橫跨冷戰前後，與安全研究從傳統到非傳統的發展有所重疊，與本文討論之議題範圍吻合；（2）哥國內戰在性質上前後略有不同，

註⑩ 雖然時間點發生較早，但不失為一個有趣並頗富思考性的例子是，中國在清朝同治九年前後鎮壓太平天國內戰時，朝廷與地方勢力和地方勢力與地方勢力間彼此的勾心鬥角及互扯後腿的行為。參考：潘美玲，清代儀式性支配及其危機：太平天國之亂與鐵路風潮，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6月），頁17。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原本以訴諸政治改革為目的幾個內戰當事方開始與毒品貿易商勾結，^⑩使得內戰衍生出的安全問題在本質上有所改變，從原本對國家或政府的威脅轉向為對哥國人民的威脅。此現象恰足以說明一旦威脅源侵擾對象有所轉變，其致生的安全問題無法透過傳統或非傳統安全獲得最佳的解釋和處理。準此，以下就哥國內戰予以簡要說明並加以分析。

哥倫比亞共和國 (the Republic of Colombia) 成立之後，雖然脫離先前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但國內政治的分裂讓這個國家並沒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和平，伴隨而來的是長期內戰，而且是南美洲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國內武裝衝突。內戰不但使人民長期處於不安全狀態，也妨礙了哥國本身的發展。其中革命武裝部隊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 FARC) 是最大的內戰當事方，總人數約 2 萬人，控制該國 40% 的領土；第二大內戰當事方為民族解放軍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ELN) 約有 5 千餘人；其次為人民解放軍 (Popular Liberation Army, EPL)；而擁有 8 千多名成員的聯合自衛隊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 AUC)，則是一個準軍事組織。這些內戰當事方在不斷與政府發生武裝衝突的同時，彼此也互相較勁，競奪適合種植罌粟等毒品植物的耕地，或是外部勢力的援助。^⑪

政府經濟政策的不當是造成哥國內戰持續不斷的主因之一，由於未能有效對經濟結構做出修正，使得以原料生產和出口的經濟模式逐漸衰退，失業率在 1995 至 1997 兩年間增加近 4%，總失業人口高達百萬人。^⑫其中農村人口的貧困情況最為嚴重，使得許多農村家庭不得不為毒梟工作或是加入地方性的叛亂組織，以維持基本生活所需。這使得毒品種植與販毒交易盛行，而非法走私毒品的所得又進一步讓毒梟和參與內戰的當事各方組織獲取經濟利益和成長空間。^⑬哥國內戰當事方普遍具有的共同特徵是，和其控制領域內的販毒集團相互勾結，為其提供安全保障，而販毒集團則對他們提供巨額資金和走私軍火的管道，讓他們可以利用這些資金招兵買馬或是用走私取的軍火去炸毀輸油管道、封鎖公路，以此引起國際關注並向政府施壓。此種內戰的實際結果是影響哥國人民生計並妨礙了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據資料顯示，武裝衝突和暴力活動每年造成的財產損失高達數百億美元，人員死傷近萬名，同時有數十萬人為躲避戰禍而流離失所。整個哥倫比亞有 67% 的人口生活處於貧困，^⑭學校教育嚴重荒

註⑩ 潘大志、宋紹松，「哥倫比亞和平夢難圓」，*國際展望*，第 2 期（2000 年），頁 10。

註⑪ Daniel H. Levine, "Between Legitimacy and Violence: A History of Colombia, 1875-2002,"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 3 (2007), pp. 734-736; Robin Kirk, *More Terrible than Death: Massacres, Drugs, and America's War in Colomb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pp. 17-44; Charles Bergquist, Ricardo Peñaranda, and Gonzalo Sánchez G., *Violence in Colombia, 1990-2000*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Books, 2001), Ch. 1-2.

註⑫ 哥倫比亞國內失業人口數據可參考：Colombia Unemployment Rate (March 31, 1990-August 31, 2007),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 <[http://www.globalfinancialdata.com/index.php3?action=detailedinfo &id=9275](http://www.globalfinancialdata.com/index.php3?action=detailedinfo&id=9275)>.

註⑬ Robin Kirk, *More Terrible than Death*, op. cit., p. 77.

註⑭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Country Fact Sheets-Colombia),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 <http://hdr.undp.org/hdr2006/statistics/countries/country_fact_sheets/cty_fs_COL.html>.

廢。更糟糕的是，持續的內戰和民生貧困反而更有利於內戰當事方的勢力增長和毒品非法交易的進行。在那些武裝活動頻繁的地區，絕大部分的兒童或年輕人，或自願或被叛亂組織強行徵召參與反政府武裝活動。哥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產國之一，古柯鹼年產量近 580 噸，占世界的 90%。而像 FARC 這樣的內戰參與方每年約可獲得 2 億至 4 億美元的收益。^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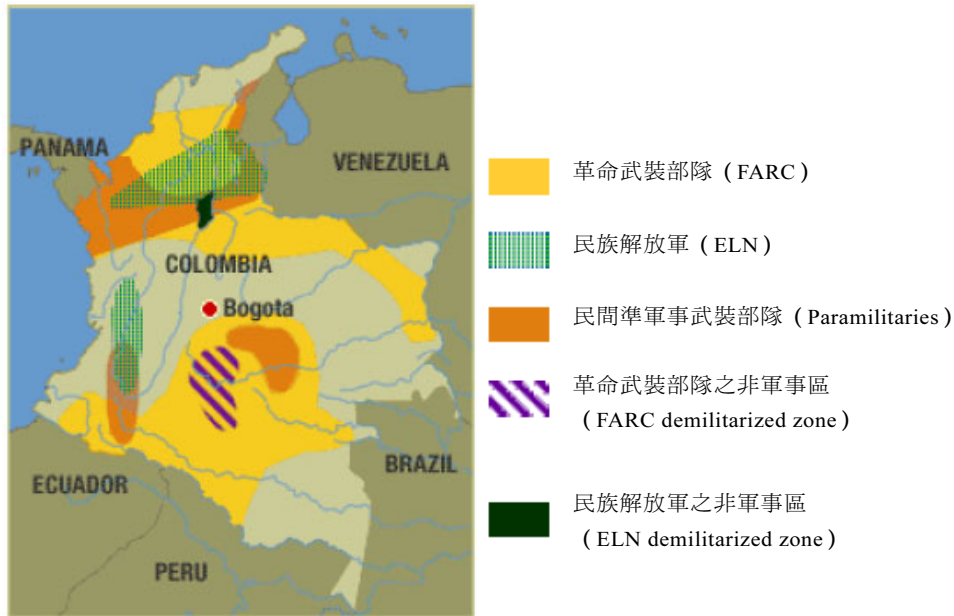


圖 2 哥倫比亞內戰主要當事方之勢力分佈

資料來源：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website: <http://www.ciponline.org/colombia/index.htm>

表 1 哥國內戰對個人安全的衝擊和對國家形成的損失 (百分比)

衝擊或損失	比例
死亡或失蹤	2.1
流離失所 (境內難民)	32.8
綁架、搶劫、其它人民財產損失	26
國家基礎建設的破壞	14.1
國家對抗叛亂組織的軍事花費	25
加總	100

資料來源：Programa de Naciones Unidas para el Desarrollo (PNUD, 2003), Informe Nacional de Desarrollo Humano-Colombia (INDH), table 4.4.

註⑮ Kirk, *More Terrible than Death*, op. cit., p. 221.

三、案例分析

當原本組成國家的個人受到國家的壓迫、威脅，或國家不再具有保護其安全和獲得資源的能力時，國家形成的基礎可以說已經不存在了。此時作為社會集合體的國家雖然沒有生存安全的憂慮，但卻反而成為自身構成基礎（即人民）不安全的威脅源。這個情況下，國家是否安全對個人來說已不具任何意義，甚至人民有權利去推翻這種無法提供安全保障的國家。¹⁶從這個角度來看，安全本身是種無法分割的概念，個人安全與國家間的關係是很強的。當國家在能確實保障個人安全的時候，國家安全才具有存在的意義，也就是個人安全的確保是國家安全的前提與核心；反之，國家如果無法履行當初人民組成與建立國家時冀望於它的功能，則個人極為可能將當初轉讓予國家的權力收回，重返原始的戰爭狀態，用自助的方式，決定誰可以擁有安全和享用資源。

哥國內戰的個案顯示，若戰爭在性質上從一國的外部威脅轉變為內部威脅、從針對國家變成針對個人時，判斷安全是否存在和安全有無被落實的關鍵將產生明顯的改變，即從國家中心朝向以「個人」為中心（見表 2）。早期國家安全所以獲得安全研究的核心地位，是因為國家與其組成份子（個人）面臨的是共同的外部威脅。簡言之，來自於外部的戰爭威脅讓國家安全和個人安全密不可分，個人如果失去了國家，自身的安危亦將受到波及。因此，國家作為一個社會集合體，順理成章的將個人安全吸收，化約為國家安全。但在內戰的例子中，顯然戰爭已不再會對國家的生存造成威脅，而人民則依舊是受到戰爭威脅的對象。簡言之，「當代的戰爭」由於性質的轉變，讓國家與人民不再同時成為共同的受害者，至少在短時間內國家可以置身事外。此種現象顯然超出目前安全研究（傳統／非傳統）能力所能處理的範圍。更明確的說，國家安全和戰爭間的關係已不如過往來得密切，相反的，個人安全是否獲得確保，才是當代影響國家安全最關鍵的因素，才是安全研究應予投入心力之所在。此外，案例也顯示，由於內戰當事方的利益與國家局勢的穩定是彼此衝突的，因此參與內戰的各方叛亂團體會刻意防止合法政府追求穩定秩序的相關政策，使得國內人民持續處於不安全的情況，而此種情況將進一步惡化國家的發展，最終危及國家本身的安全（見表 1）。哥倫比亞內戰參雜了許多原因，如貧富懸殊、資源分配不均、意識型態之爭等等，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可以透過改善人民生活得到有效抒解，若哥國政府只是單以鎮壓或談判的方式與內戰當事方互動，恐怕內戰只會加劇與持續，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和該國本身長遠的安全。

註¹⁶ Wolfgang Schwarz, "The Right of Resistance," *Ethics*, Vol. 74, No. 2 (1964), pp. 126~134.

表2 研究案例分析說明

威脅源的來源 威脅源侵擾的對象	外部威脅	內部威脅
國家	威脅同時對國家與人民產生影響，因此國家與人民成爲生命共同體，但由前者主導了安全的優先性。個人安全被化約，與國家安全融爲一體。	不會對國家構成立即的生存危害。
個人		對個人生活安全產生立即的影響，但隨時間的積累最終也同樣影響國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陸、結 論

傳統安全研究與軍事安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特別在冷戰期間，軍事安全與國家安全緊密的結合，免於軍事威脅和強化自我軍事力量成爲確保國家安全的核心關切，至於個人的安全問題近乎被全然忽略，並視爲是與國家無關。然冷戰的結束，讓軍事安全的重要性被經濟等其他新興安全議題所取代，同時發展出異於傳統安全的非傳統安全研究。這樣的發展雖然有助於安全研究的多樣性和對安全威脅源多樣化的現象予以掌握，但因爲還是偏向以國家作爲安全研究的主體，故而在個案中有無法檢驗安全是否確實達到或獲得落實的盲點。此觀點在關於哥倫比亞內戰的說明中獲得了印證。此外，個案也指出當威脅源的來源和針對對象發生轉變時，無論傳統安全還是非傳統安全都有無法解決問題的困境存在。相較之下，以「個人」作爲安全研究主體的人類安全具有因應此種問題的能力，它能迎合冷戰後全球化的國際局勢，^⑩同時對威脅來源轉向「內部」的相關安全問題提出解釋。

在表3中可以清楚得知，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主要是探析國家的安全（偶爾向外延伸至區域或國際安全，或向內關注社會的安全），而人類安全則是針對「個人」的安全。惟實際上，國家脫離不了與個人的關係；人是構成國家的主要元素及最基本單位，國家是透過個人而成立的社會集合體。^⑪因此，無論表面上一向有關安全的概念

註⑩ 當代國際關係所談論的許多議題，諸如能源、發展、科技、宗教、族群等，皆與整個地球的每個人息息相關。而人類安全正是爲保護此等內涵上無法斷然區隔之個人普世性權利的安全研究。王崑義、蔡裕明，「全球化、人類安全與後 SARS 時代：兩岸非傳統安全的新議題」，頁 162~163；李瓊莉，「人類安全——台灣對外關係的新政策議題」，人類安全（台北，台灣心會，2004 年），頁 81。

註⑪ 根據《國家權利與責任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f 1933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要成爲國際法上的國家必須要具備下列四項要件：即「固定的領土」（a defined territory）、「一定的人口」（a permanent population）、「有效統治的政府」（an effective government）、「和其他國家發生關係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此四項要件具備，方屬國際法上適格的主權國家；而人民爲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項。

與國家多麼地密切，其本質均無法與個人安全的保護脫勾。其次，在威脅源部分，無論威脅源的態樣或是來源處為何，均必然對個人的安全造成侵擾，因為國家是抽象的存在，無法實際上成為被侵擾的對象，當吾人認知到國家處於不安全時，嚴格來說是人民的某項安全領域受到破壞後所呈現出的結果。舉例來說，判定一國在軍事上陷於不安全是因為邊境上的人民受到敵國的武裝攻擊而喪失了生命與財物；判定一國在經濟上陷於不安全未必是因為國家財政出現赤字，而可能是因為人民的失業率上升、貧窮階級的大量存在。¹⁰最後，關於安全研究的目的與其說是要保護國家，不如說是要保護國家內部的個人，因為一旦個人的安全條件喪失，很難不牽動整體社會或國家的安全，只是個人的不安全要多久才會危及國家安全在時間上有長有短，並不容易準確預測。但可以確定的是，安全要維護的對象與核心價值，其實就是組成國家的最基本元素——個人。

表 3 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與人類安全比較表

安全研究類型	研究對象	威脅源（態樣和來源）	目標
傳統安全	國家 ¹⁰	來自他國（外部）的軍事威脅 ¹¹	保護本國的生存、領土完整、政治獨立
非傳統安全	國家為主 （但開始論及社會性的安全議題）	來自外部的國家或國家以外行為者的各種非軍事的直接與間接威脅源，例如他國經濟制裁、或在本國進行投資開發形成的環境惡化 ¹²	強調與周遭各行為體的休戚與共關係，關切彼此共同的利益，例如貿易的供需關係、跨界河流的污染問題、疾病的傳染等。
人類安全	人 （每個人）	對個人的軍事或非軍事威脅	讓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能免於恐懼，獲得選擇生活的自由。不再被歧視或喪失維持基本生活的客觀條件與環境。
重疊性	都有個人的部分 （但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研究中個人因素被邊緣化，導致安全是否落實的檢驗出現盲點）	無論威脅態樣、來源為何，都會對個人構成威脅和安全的侵擾	安全要維護的部分皆有「人」存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註¹⁰ 個人的失業或貧窮容易造成階級間的對立與暴力衝突，而暴力衝突所造成的軟、硬體設施的破壞與社會秩序的動盪，最終可能使得國家經濟體制出現停擺的後果。此外，國際勞工組織於分析 90 個國家境內經濟情況後發現「富裕顯然無法保障經濟安全」。參考：<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es/download/docs/happiness.pdf>

註¹¹ 在軍事領域，安全的指涉對象雖然也可能是其它類型的實體，但通常是國家。Buzan, Waever, de Wilde, *op. cit.*, pp. 25~35.

註¹² 同前註，傳統安全研究往往將所有的軍事事務當成範例來分析，並將之視為威脅的首要來源。

註¹³ 非軍事的「直接」威脅還有可能是外國對本國進行貿易傾銷，造成本國同類產業受創；非軍事的「間接」威脅源有可能是國家為了追求發展而獎勵特定國內產業，導致開發過程中對自然生態的破壞。

人類安全之所以重要或是值得研究，正是因為這樣的安全概念是一種強調每一個「個人」權利的安全，而不是「集體」權利的安全。若人類安全強調的是集體式的安全，那麼傳統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研究之一切弊病，人類安全均將難以避免。相反地，人類安全是一種彌補現有安全研究侷限之分析安全途徑，它比傳統安全或非傳統安全更為有效地解釋當代戰爭、環境污染、糧食缺乏、發展不均等非軍事性的安全問題。易言之，人類安全是對現有安全研究的一種修正，對既存的安全理念或是論述進行再形塑與反思，質疑主權國家與軍事議題是否真的應該成為安全研究的核心關切。⑬人類安全透過「以人為本」的思考，以無歧視的態度去重視每一個「個人」追求與獲得安全的權利，因為「個人」的安全獲得重視與落實之後，「集體」的安全問題將自然獲得解決。試想，如果每個「個人」的需要都獲得尊重與公平的對待，⑭能被一視同仁的照顧，誰還會冒著死亡的風險去參與內戰或推翻現有的國家回到原始的戰爭狀態？⑮

* * *

(收件：96年7月13日，接受：97年1月16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⑬ Edward Newman, *op. cit.*, pp. 247~248.

註⑭ 尊重與公平對待遠較需求的「滿足」更為重要。因為人類慾望是無窮的，滿足的作法不具有可能性，因此並非解決衝突或保護人權的治本之道。誠摯的尊重個人需求，在落實過程中儘可能的給予公正平等之對待（實質公平而非齊頭式的公平），才是預防衝突與維護人權的根本之法。

註⑮ 霍布斯巨靈論中即已清楚說明「國家」的來源正是因為人類本性中那種畏死的激情使然。

From “State” to “People”: In Light of Human Security

Yu-tai Ts'ai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ei-en Ta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Even though the concept of Human Security first emerged more than a decade ago, it never gain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stud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y somehow rectified the defect of 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y that focused simply on military affairs, and wa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to understand the crucial role ‘People’ played in security study. From authors’ view, the present comprehension of security study can no longer catch up with the mainstream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o exclude ‘People’ from discussing or to marginalize it is a definite miscalculation of what ‘security’ really is. Either traditional security, which pays main attention to territorial matters, 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which cares more about poverty, development, disease, its core and essential value of security is no doubt based on ‘People’. In fact,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is a spectrum that cannot be divided; also, the spectrum has considerable inter-links and overlaps. An effect to one dimension of security is likely to travel to all forms of security. The phenomenon of interdependency on economic dimension is also relevant to security studies. By a case study of the Colombia civil war,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the study of human security can help resolve threats from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achieve true security. It manifests the necessity of the study of security from focusing on “state” to the “people”.

Keywords: civil war; human securit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udy; traditional security

參考文獻

- 王文，「超越兩分法：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前途」，*國際觀察*，第 2 期（2005 年），頁 39~45。
- 王逸舟，*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王崑義、蔡裕明，「全球化、人類安全與後 SARS 時代：兩岸非傳統安全的新議題」，*遠景季刊*，第 5 卷第 2 期（2004 年 4 月），頁 153~193。
- 巴瑞·布贊（B. Buzan）、奧利·維夫（O. Waever）、迪·懷爾德（J. de Wilde）著，*新安全論*，朱寧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出版社，1981 年）。
- 宋燕輝，『人類安全』之發展與推動：亞太國家的態度及作法」，*人類安全與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研討會*，台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主辦（2001 年 9 月 14 日）。
- 李瓊莉，「人類安全——台灣對外關係的新政策議題」，*人類安全*（台北，台灣心會，2004 年），頁 81。
- 林碧昭，「全球化與人類安全」，*人類安全與廿一世紀的兩岸關係研討會*，臺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主辦（2001 年 9 月 14 日）。
-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001 年夏季號），頁 231~264。
- 黃旻華，「主權國家的起源、演變與未來發展：時空因素的重要性」，*政治學報*，第 38 期（2004 年 12 月），頁 1~57。
- 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台北：時英，2003 年）。
- 莊雅仲，「民主化及其不滿：被動革命、民族主義與反抗的政治」，收錄於*台灣歷史學會編，邁向 21 世紀的台灣歷史學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 年）。
- 潘大志、宋紹松，「哥倫比亞和平夢難圓」，*國際展望*，第 2 期（2000 年），頁 10~11。
- 潘美玲，*清代儀式性支配及其危機：太平天國之亂與鐵路風潮*，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 6 月）。
- 盧倩儀，「發展中的『人類安全』概念及其在歐盟非法移民問題上之適用」，*問題與研究*，第 46 卷第 4 期（民國 96 年 10~12 月），頁 27~52。
- 譚偉恩，「女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國際關係學報*，第 23 期（2007 年 1 月），頁 141~162。
- ，「權力平衡的研究：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關係學報*，第 22 期（2006 年 7 月），頁 129~166。
- Adams, R. M.,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
- Addams, Jane, Emily G. Balch, and Alice Hamilton, *Women at the Hague: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 and Its Resul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
- Anold, J. E., "Labor and the Rise of Complex Hunter-gatherer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 Archaeology*, Vol. 12 (1993), pp. 75~119.
- Banks, William C. and Jeffrey D. Straussman, "Defense Contingency Budgeting in the Post-cold-war World,"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59, No. 2 (1999), pp. 135~138.
- Baldwin, David A.,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1995), pp. 117~141.
- ,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1997), pp. 5~26.
- Bajpai, Kanti, "Human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Kroc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No. 9 (2000), at<http://www.nd.edu/krocinst/ocpapers/op_19_1.pdf>.
- Bergquist, Charles, *Violence in Colombia, 1990-2000*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Books, 2001).
- Biersteker, Thomas J.,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st-Posi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1989), pp. 263~267.
- Booth, Ken,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13~326.
- , "Security in Anarchy: 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3, No. 3 (1991), pp. 527~545.
- Brainard, Lael, Derek Chollet, and Vinca LaFleur, "The Tangled Web: The Poverty-Insecurity Nexus," in Lael Brainard and Derek Chollet, eds., *Too Poor for Peace?: Global Poverty,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pp. 1~30.
- Brodie, Bernard, "On the Objectives of Arms Contro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 No. 1 (1976), pp. 17~36.
- Bronowski, Jacob and Brace Mazlish,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0).
- Brown, Sey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System: Toward a Theory of World Poli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 Burchill, Scott and Andrew Linklater,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 Buzan, Barry,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 1991).
- Buzan, Barry,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7).
- Buzan, Barry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arneiro, Robert L.,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Vol. 169, No. 21 (1970), pp. 733~738.

- Carpenter, Charli, "Gender Theory in World Politics: Contributions of a Non-feminist Standpoi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2002), pp. 153~165.
- Carson, Rachel,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
- Cohen, Ronald, and Elman Service,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8).
-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Now* (2003), at<<http://www.humansecurity-chs.org/index.html>>.
- Deudney, Daniel, "The Case Against Link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9, No. 3 (1990), pp. 461~476.
- Dougherty, James E.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eds.,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Longman, 2001).
- Doyle, Michael, "Kant, Liberal Legacy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3 (1983), pp. 323~353.
- ,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1986), pp. 1151~1169.
- Doyle, Timothy and Doug McEachern, *Environment an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Earle, Edward M.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 Evera, Stephen Van, "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8), pp. 257~291.
- Farazmand, Ali,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59, No. 6 (1999), pp. 509~522.
- Fulvio, Attinà and Zhu Guichang, "Security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Partnerships,"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 5, No. 1 (2001), pp. 85~110.
- Garnett, John ed., *Theory of Peace and Security: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trategic Though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0).
- Ginkel, Hans Van and Edward Newman, "In Quest of "Human Security,"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4, No. 1 (2000), pp. 59~82.
- Glaser, Charles L., "Realism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50~90.
- Grieco, Joseph M.,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 116~142.
- Haftendorn, Helga,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 Vol. 35, No. 1 (1991) , pp. 3~17.
- Hardin, Garre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 (1968) , pp. 1243~1248.
- Holsti, Kalevi J.,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Country Fact Sheets-Colombia) ,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 <http://hdr.undp.org/hdr2006/statistics/countries/country_fact_sheets/cty_fs_COL.html>.
- Johansen, Robert, "A Policy Framework for World Security," in Michael T. Klare and Daniel C. Thomas, eds., *World Security: Trends and Challenges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 pp. 401~424.
- Jordan, Amos and William Taylo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Process*, revise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Katzenstein, Peter,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p. 1~26.
- King, Gary and Christopher Murray,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4 (2002) , pp. 585~610.
- Kirk, Robin, *More Terrible than Death: Massacres, Drugs, and America's War in Colombi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
- Kolodziej, Edward J., "Renaissance in Security Studies: Caveat Lect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 (1992) , pp. 421~438.
- Lake, David and Donald Rothchild, "Containing Fear: The Origins and Management of Ethnic Conflict,"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orie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8) , pp. 292~327.
- Lapid, Yosef,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1989) , pp. 235~254.
- Levine, Daniel H., "Between Legitimacy and Violence: A History of Colombia, 1875-2002,"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 3 (2007) , pp. 734~736.
- Linklater, Andrew,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Human Security," in Ken Booth e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 , pp. 113~131.
- Lund, William R., "Tragedy and Educatio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Hobbes on Time and the wil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48, No. 3 (1987) , pp. 393~410.
- Macmillan, John, "Whose Democracy? Which Peace? Contextualizing the Democratic

- Pea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 41 (2004), pp. 472~493.
- Mangold, Pet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0).
- Mathews, Jessica Tuchman,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2 (1989), pp. 162~177.
- ,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1 (1997), pp. 50~67.
- Mazlish, Bruce and Bronowski,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0).
- McDonald, Matt, “Human Secu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curity,” *Globa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Issue 3 (2002), pp. 277~295.
- McSweeney, Bill,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eadows, Donella H.,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 Mearsheimer, John J.,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1 (1990), pp. 5~56.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95), pp. 5~49.
- Miller, Steven 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t Twenty-five: From One World to Ano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2001), pp. 5~39.
- , ed.,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ilner, Helen,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43~169.
-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 Morley, Robert and John Marwitt, “Ecology, Economy, and Warfare in Lowland South America,” in Martin Nettleship, ed., *War: Its Causes and Correlates* (Hague: Mouton, 1975), pp. 440~450.
- Mutimer, David, “Beyond Strategy: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New Security Studies,” in Craig A. Snyder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pp. 77~101.
- Myers, Norma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No. 74 (1989), pp. 23~41.
- Müller, Harald,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 369~391.

- Navon, Emmanuel,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 (2001), pp. 611~625.
- Nettleship, Martin, ed., *War: Its Causes and Correlates* (Hague: Mouton, 1975).
- Newman, Edward,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2, No. 3 (2001), pp. 239~251.
- Nisbet, H. B.,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Nye, Jr. Joseph S. and Sean M. Lynn-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1988), pp. 5~27.
- Ogata, Sadako, "Human Security: A Refugee Perspective," Keynote Speech at the Ministerial Meeting on Human Security Issues of the Lysoen Process' Group of Governments, Bergen, Norway (May 19, 1999).
- , "Enabling People to Live in Security," Keynote Speech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 Security, Tokyo (July 28, 2000).
- , "Empowering People for Human Security," Payne Lec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28, 2003), <http://www.humansecurity-chs.org/>.
- Onuf, Nicholas and Paul Kowar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 E. Shapre Inc., 1998).
- , "Constructivism: A User's Manual," in Vendulka Kubalkova, Nicholas Onuf and Paul Kowert,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onstructed Worl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pp. 58~77.
- Oye, Kenneth A. ed.,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Page, Edward., "Theorizing the Link Between Environment Changing and Security,"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9, No. 1 (2000), pp. 33~43.
- Panke, Diana and Thomas Risse, "Liberalism," in Tim Dunn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89~107.
- Raitasalo, J. J., "Reconstructing War after the Cold W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arch, 2005), Hilton Hawaiian Village, Honolulu, Hawaii, please go the website at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71257_index.html>.
- Renner, Michael, "National Security: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World Watch Paper*, No. 89 (1989), p. 6.
- Rothschild, Emma, "What is Security?" *Daedalus*, Vol. 124, No. 3 (1995), pp. 53~98.
- Rousseau, Jean Jacques,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 Constitution Society, at <http://www.constitution.org/jjr/socon_01.htm#006>.

- Russett, Bruce,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Schwarz, Wolfgang, "The Right of Resistance," *Ethics*, Vol. 74, No. 2 (1964) , pp.126~134.
- Smith, Steve, "The Increasing Insecurity of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in Stuart Croft and Terry Terriff, ed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ecurity and Change* (London: Frank Cass, 2000) , pp. 72~101.
- "Stockholm Initiative on Glob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1990's* (Stockholm: Prime Minister's Office, 1991) .
- "Sudanese army elements attack UN convoy; Ban Ki-moon protests," at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25231&Cr=Darfur&Cr1=>>>.
- Sylvester, Christine,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 Tainter, J. A.,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Takasu, Yukio, "Toward Effective Cross-sectoral Partnership to Ensure Human Secur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Third Intellectual Dialogue on Building Asia's Tomorrow*, June 19, 2000, Bangkok, at <http://www.mofa.go.jp/policy/human_secu/speech0006.html>.
- Taliaferro, Jeffrey,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01) , pp. 128~161.
- Tickner, J. Ann, "Re-visioning Securit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 pp. 175~197.
- and Laura Sjoberg, "Feminism," in Tim Dume, 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pp. 185~202.
- Terriff, Terry, Stuart Croft, Lucy James, and Patrick M. Morgan, *Secur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
-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UNDP, 1994) , at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4/en/>>>.
- Ullman, Richard H., "R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1983) , pp. 129~155.
- Walker, R. B. J., *One World ,Many Worlds: Struggles for a Just World Pea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8) .
- ,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litics," *Alternatives*, Vol.15, No.1 (1990) , pp. 3~27.
- Walt, Stephen,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1991) , pp. 211~239.
- ,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altz, Kenneth N., "A Strategy for the Rapid Deployment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5, No. 4 (1981) , pp. 49~73.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1979)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illiams, Michael C., "Modernity, identity and security: a comment on the 'Copenhagen controvers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3 (1998) , pp. 435~439.

William, Olson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4) .

Wittfogel, Karl, "Hydraulic Civilizations," in W. L. Thomas,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 pp. 152~164.

Wolfers, Arnold,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

Waever, Ole,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p. 46~86.